
欧亚人文研究

原《俄语学习》

Eurasian Humanities Studies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 / 王铭玉、王双燕

俄藏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 李逸津

沃尔夫主义在 18 世纪的俄罗斯 / 姜宏、赵爱国

试论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的体裁特征 / 朱涛

2020 · 1 季刊

欧亚人文研究 (季刊)

OUYA RENWEN YANJIU

原《俄语学习》

2020年第1期

目 录

· “一带一路”研究 ·

- “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战略····· 王铭玉 王双燕 (1)
- 中亚有条件成为“一带一路”示范区····· 赵常庆 (12)
- 中亚国家的多语政策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影响····· 魏梓秋 黄思宇 (19)

· 俄罗斯语言学研究 ·

- 沃尔夫主义在18世纪的俄罗斯····· 姜宏 赵爱国 (27)
- 论福尔图纳托夫的语言哲学思想····· 程芸 (36)
- 帕杜切娃词义动态模式对汉语多义词研究的启示····· 李瑞 (42)

· 俄罗斯文学研究 ·

- 试论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的体裁特征····· 朱涛 (50)
- 狂暴时代的冷静与清醒之音——解读《基坑》中的女性书写····· 杨世海 (57)

· 中俄文化交流 ·

- 俄藏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李逸津 (64)
- 新时期俄苏少儿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奥·彼·罗季奥诺娃 (71)
- 俄罗斯外交人才培养及其对中俄关系的贡献——以圣彼得堡大学为例····· 尼·安·萨莫依洛夫 (80)

· 书评 ·

- 思想离散与认同危机——《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中的思想世界述评····· 华盾 (87)
- 《欧亚人文研究》稿件体例····· (93)

Contents

The BRI Studies

-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anguage Program for the BRI *WANG Mingyu, WANG Shuangyan* (1)
- Central Asia is Eligible to Become a “Belt and Road” Demonstration Zone *ZHAO Changqing* (12)
- The Multilingual Policy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WEI Ziqiu, HUANG Siyu* (19)

Russian Linguistic Studies

- Wolffianism in Russia in the 18th Century *JIANG Hong, ZHAO Aiguo* (27)
- On Fortunatov’s Thought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HENG Yun* (36)
-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ynamic Model of Lexical Semantics by Paducheva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ysemants *LI Rui* (42)

Russian Literary Studies

- On the Genre Features of Large Russian Literary Periodicals *ZHU Tao* (50)
- The Sober Voice in the Radical Time—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riting of Females in *Kotlovan*
..... *YANG Shihai* (57)

Sino-Russian Cultural Exchange

-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of Russian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 *LI Yijin* (64)
- Trans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Russian and Soviet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 *O. P. RODIONOVA* (71)
- Russian Diplomatic Talents Training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ino-Russia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N. A. SAMOILOV* (80)

Book Review

- Ideology Division and Identity Crisis: A Review of the World of Ideas in *The World of 2035:*
Global Outlook *HUA Dun* (87)
- Stylistic Rules of Papers Contributed to Eurasian Humanities Studies (93)

俄罗斯外交人才培养及其对中俄关系的贡献 ——以圣彼得堡大学为例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尼·安·萨莫依洛夫

熊乐平 译

提 要：本文主要研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生自19世纪下半叶起至今在中俄（中苏）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圣彼得堡大学（主要是东方系）的毕业生在俄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中身居要职，担任大使、参赞、领事、翻译等，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始终保持职业素养，具备专业技能，了解中国国情且熟练掌握汉语，这使得他们能够出色地履行自身的外交职责。许多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和教师虽不是职业外交官，也曾在与中俄关系有关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促进了两国间外交、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发展。

关键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俄罗斯；中俄关系；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756(2020)01-0080-07

本文旨在研究圣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在中俄关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两国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许多曾在我校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或多或少与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关，如果要描述其中每个人的贡献，则需要撰写多部特刊。囿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着墨于几位贡献突出的人物。

1854年10月22日（新历11月3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语言系，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它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的东方学发展中也是一次独具匠心的突破。杰出的东方学家、历史学家格里高利耶夫（В.В. Григорьев）对此写道：“……在圣彼得堡大学里开辟了欧洲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的专业方向，这种形式也只能在俄国出现。”（Григорьев, 1870: 125）

东方系从成立之初就有针对性地培养学术和实践能力兼优的东方学家。因此许多毕业生都在外交领域找到了归属感，这促进了俄罗斯与东方各国的交流。东方系的首任系主任卡泽姆-别克教授（А.К. Казем-Бек）早在1857年就对此表示，“可以肯定而明确地得出结论，我系的任务是纯实践性的，直接应用于实务——就是培养年轻人为外交、军事和其他部门服务……”（Материалы, 1905: 392）

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首批毕业生开始，在外交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年轻人就层出不穷。

就中国和中俄关系而言，想必一切该从韦伯（К.И. Вебер）（1841-1910）说起。1865年东方语言系毕业后，他选择了外交官职业。1876年起他在天津担任领事，1882年11月至1883年10月担任驻华公使。尽管他外交职业生涯的主要部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声誉主要与朝鲜有关（Пак, 2013），但他是公认的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生中首位对中俄关系做出贡献的人。

在韦伯之后许多圣彼得堡大学的汉学专业毕业生都曾在重要的驻华外交岗位上任职。其中包括：普朗松(Г.А. Плансон)——1902–1903年俄驻华代办,此后担任驻暹罗^①公使,在校完成了两个系的学业:东方系和法律系;科扎科夫(Г.А. Козаков)——1904–1905年间担任俄驻华一等秘书,短期担任代办,此后成为外交部远东局局长,二月革命后曾被推选为驻华公使的候选人;格罗瑟(В.Ф. Гроссе)——1911–1924年间任俄驻上海总领事;科洛科洛夫(С.А. Колоколов)——奉天^②领事(自1901年),喀什领事(自1904年),福州领事(自1910年),奉天总领事(自1910年);别尔琴科(А.Т. Бельченко)——福州领事(1910年),广州领事(1913–1914年),汉口领事(1914–1916年);柳巴(В.Ф. Люба)——1907–1909年间任哈尔滨总领事。

但在这光辉的背景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还有一位毕业生表现尤为突出,他就是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波科蒂洛夫(Д.Д. Покотилов)。

大学毕业后波科蒂洛夫进入外交部工作,期间曾赴华出差。后来他转入财政部,成为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维特(С.Ю. Витте)的亲信之一,有时他甚至被称为“维特在远东的耳目”。1895年为投资修建中东铁路成立中俄银行时,波科蒂洛夫被任命为北京分行的行长。自1897年1月起,他继续担任财政部驻华官方代表,参加了有关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地位的谈判。1905年俄驻北京公使列萨尔(П.М. Лессар)过世后,波科蒂洛夫接替了这个岗位,直至1908年去世。

波科蒂洛夫着实是一位非凡人士。在他突然离世后,俄罗斯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精力充沛的人”,“作为俄罗斯官方代表,他对驻在国了如指掌”(Нива, 1908: 216)。当时在东方系教授蒙古语和其他东方语言、还身兼财政部工作的科特维奇(В.Л. Котвич)教授在谈及波科蒂洛夫时写道:“1887年所有课程结束时,波科蒂洛夫和东方语言系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面临两条道路:外交和学术。他试图把这两个方向结合起来……波科蒂洛夫受到中国官员的青睐,总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已故的李鸿章特别欣赏他。当驻北京公使的职位空缺时,候选人波科蒂洛夫的非凡品质促使拉姆斯多夫^③(В.Н. Ламздорф)不顾外交部的惯例,把俄驻京代表的重任托付给了这位前银行行长。”(Котвич, 1908)

波科蒂洛夫的例子说明,只有精通汉语、充分了解中国的人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驻华外交官,而圣彼得堡大学着力培养的就是这类人才。

就此完全可以赞同著名俄东方学历史研究者霍赫洛夫(А.Н. Хохлов)对波科蒂洛夫的评价:“在俄罗斯外交使团驻北京的历史中,从巴柳泽克(Л.Ф. Балюзек)(自1861年来首位驻中国首都的驻办公使),到库达舍夫(Н.А. Кудашев)公使(在其任职期间,中国政府于1920年关闭了沙俄的外交代表处),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特命全权公使级的人员中波科蒂洛夫(1865–1908)的才干是无人可比的。俄外交官中唯有他,不仅汉语讲得非常好,而且掌握满清统治时期(1644–1912年间)的汉语书面文字。”(Хохлов, 2011: 36)

1917年十月革命后,外交工作的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在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最看重的是革命出身,但人们渐渐意识到,外交官首先必须是一名专业人士,对其所驻国要非常了解,因此国别研究专家、学者开始进入外交人民委员会。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④的毕业生、教师彼得罗夫(А.А. Петров)(1907–1946)就成为上述专家学者其中

① 译者注:暹罗——泰国的古称。

② 译者注:奉天——沈阳的旧称。

③ 译者注:拉姆斯多夫(1845–1907)——1900–1906年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

④ 译者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于1924至1991年名为列宁格勒国立大学。

一员。1930年他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语言系毕业,专业方向为中国^⑤。他的老师是列宁格勒汉学界公认的领袖阿列克谢耶夫^⑥(В.М. Алексеев)院士。1935年彼得罗夫被授予哲学副博士学位,并以专著的形式发表了其学位论文《王弼及其哲学世界观的主要问题》(Петров, 1936)。公元3世纪中国思想家王弼是中国哲学流派——玄学的奠基者之一,年轻学者彼得罗夫在其论文中详细研究了王弼的著述思想。彼得罗夫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对问题实质把握深刻,对文本的语言分析细致。1936年至1941年他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教授汉学方面的课程。

20世纪40年代初,外交人民委员会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开始从国内各大高校挑选人才。在苏联最困难的1941年,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彼得罗夫应召进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2年5月他携家属前往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迁都重庆。彼得罗夫在重庆担任一等秘书,后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1943年至1945年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央机关工作,先是担任副局长,后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出版局局长。

彼得罗夫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是1945到1948年。在这段中苏关系最复杂的时期,他从1945年4月3日至1948年2月25日担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有意思的巧合是,他递交国书的日子是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当日无条件投降。因此彼得罗夫成为了我校又一名在中国担任大使要职的毕业生,他为苏联时期积极吸纳列宁格勒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优秀汉学家担任外交要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杰出的中国学者、历史学家、外交家齐赫文斯基(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也开始了外交生涯。1918年他出生在彼得格勒^⑦,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尽管在形式上他后来毕业于另一所学校,但他骄傲地认为自己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毕业生,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以及列宁格勒其他著名的汉学家都是他的老师。到1938年,外交人民委员会面临高级人才的严重不足,外委会宣布进行共青团招募,全国开始遴选青年才俊从事相关工作,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学生齐赫文斯基当即被选中,他后来也因此不得不作为校外考生参加四年级的考试。实际上他刚进入外委会就被安排执行重大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39年他作为翻译参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伏罗希洛夫(К.Е. Ворошилов)、米高扬(А.И. Микоян)与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会谈。

1943年齐赫文斯基被派往当时位于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在那儿的工作非常复杂和紧张。尽管如此,齐赫文斯基并没有中断学术研究。这些20世纪下半叶的伟大汉学家们正是在重庆建立了渊源,因为他们当时都在中国的临时首都从事外交工作。比如,齐赫文斯基写道,“我们经常在美国文化中心的阅览室与外国同行见面,至1943年秋该中心由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⑧管理;中英文化协会内的‘北-南’俱乐部也是我们非正式会面的地点。俱乐部的常客有英国文化协会代表李约瑟(Joseph

^⑤ 作者注:有时会遇到不恰当的表述,如“彼得罗夫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学习。”见1977年《远东问题》第2期215页《阿·亚·彼得罗夫(70周年诞辰)》一文。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1919年东方语言系被撤销,此后东方学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语文各系部进行授课。东方系于1944年重建。

^⑥ 译者注: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生于圣彼得堡,苏联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把苏联汉学推向新的高度,培养了众多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生译著甚丰,作品多次在华出版。

^⑦ 译者注:圣彼得堡于1914-1924年间名为彼得格勒。

^⑧ 作者注:费正清(1907-1991)——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许多汉学研究方向的奠基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Needham)^⑨, 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⑩……”(Тихвинский, 1992: 33)

1945年齐赫文斯基完成副博士学位论文后在莫斯科成功答辩,并再度前往中国。这次他在苏联驻北平(北京旧称)总领事馆工作,最终被任命为总领事。1949年10月1日齐赫文斯基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参加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当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要员向他转交了一封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苏联政府高层的信件,信中提到新中国政府希望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正是由于齐赫文斯基的高效工作,该消息被立即传至莫斯科,10月2日苏联政府就向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发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

几个月之后,齐赫文斯基亲自参与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筹备工作,并陪同中国领导人抵达苏联边境,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齐赫文斯基就此回忆道:“1949年12月6日,我陪同毛泽东坐上了北京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为了参加斯大林70岁大寿的庆典首次前往莫斯科。我随车把毛泽东送到了苏联边境,毛泽东在那里坐上了苏联的火车,我当时拍下了他的照片留作纪念。”(Тихвинский, 2009: 16)

1950年齐赫文斯基开始积极帮助新中国培养外交人才,在周恩来的亲自推荐下,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国青年外交官授课。齐赫文斯基在外交岗位上(在英国、日本等地)工作至1957年,此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学术活动中,成为了公认的苏联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领军人物,并于1981年当选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

1971年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教师古萨罗夫(В.Ф. Гусаров)完成了题为《韩愈(768-824年)的散文遗产》(«Проза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Хань Юя (768-824 гг.)»)的论文答辩,论文研究了中国杰出儒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韩愈的创作和观点。古萨罗夫饱览了那个时期的儒家文献,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环境非常了解,善于揭示汉语文本的深层含义。他很关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宗教哲学思想对社会政治实践的影响问题。正是因为知识渊博,他在阅读媒体报道时才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60-70年代社会生活的许多内容。

列宁格勒大学教师古萨罗夫的这些研究对20世纪70年代初的苏联外交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当时中国开展了著名的“批林批孔”运动,要了解这种不寻常的政治运动的原因,恰恰需要古萨罗夫的研究和分析方法。

古萨罗夫曾两次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1972年至1978年任一等秘书,1982年至1989年任参赞。费多托夫(В.П. Федотов)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在我国(俄罗斯)驻北京的大使馆工作多年。上世纪90年代,他曾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担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费多托夫在其著作《与中国共度半个世纪》(«Полвека вместе с Китаем»)中对古萨罗夫在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给予了全面评价:“古萨罗夫异常聪明,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专家,还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的学者、分析家、政论家。担任中国国内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期间,他发挥了骨干作用,为大使馆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解读了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谜题,破译了由‘左翼分子’围绕长篇小说《水浒传》挑起的喧嚣。他审慎,逻辑严密且善于说服他人。他最先提出,阅读《人民日报》版面一事只能由他亲历亲为,不可交给年轻外交官,以免错过报内重要的政

^⑨ 作者注:李约瑟(1900-1995)——涉足多学科的英国学者: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喜爱汉学,因其对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科学的研究而成名。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成员,获名誉勋位。世界多所大学的教授和荣誉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荣誉顾问,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⑩ 作者注:高罗佩(1910-1967)——荷兰汉学家、外交官、音乐家和翻译家。他是20世纪最博学的汉学家之一。著有基础科学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他广为人知的作品还有关于中国法官狄公的系列侦探小说。

治主张。”(Федотов, 2005)

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和外交官——阿·勃列日涅夫(А.А. Брежнев),70年代曾在苏联驻华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曾这样评价古萨罗夫,身为学者的古萨罗夫做外交官工作,非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Брежнев, 1998)。

1989年古萨罗夫参加了戈尔巴乔夫(М.С. Горбачев)访华的准备工作。他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贡献得到了外交部高度评价:他不仅获得了苏联外交部授予的荣誉证书,还被列入了我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荣誉簿。

外交部的工作结束后,古萨罗夫再次回到列宁格勒大学,被聘为副教授。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与学生们阅读汉语文本:不仅有古代作家的作品,还有现代经济和社会政治文章。他向学生们解释称,不了解历史根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今天我们想进一步说明,他在驻华大使馆的工作经历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想特别介绍的是我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斯别什涅夫(Н.А. Спешнев)(1931-2011)。他1931年出生在北京,在中国上小学和中学,汉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二母语。1957年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他还是学生时,就已经开始给高年级学生教授汉语口语。尽管斯别什涅夫似乎从未在外交部正式工作过,但他的能力和水平始终是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各个方面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他多次将我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谈翻译成汉语,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他还曾多次作为专家参与高层会晤。1972年至1974年斯别什涅夫作为苏联政府代表团的翻译专家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苏中边界问题谈判。苏联代表团由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Л.Ф. Ильичев)领导,斯别什涅夫多次为我们的代表团提供了重要的翻译服务,非常准确地翻译出了中方代表发言的微妙之处。斯别什涅夫在他的回忆中生动地描述了围绕会谈所涉及的复杂的翻译问题(Спешнев, 2004)。

我校另一位毕业生冈察洛夫(С.Н. Гончаров)也是学者典范,他充分证明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是外交和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实践活动的良好基础,这位精通中国中世纪历史的杰出专家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汉学实践家。

冈察洛夫是个有天分的学生,1974年他从新西伯利亚大学转至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接受汉学教育,他在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学习,深入研究古汉语和中世纪历史。后来他开始从事翻译和研究中国各朝历史。冈察洛夫在东方系的指导教师包括优秀的汉学家斯莫林(Г.Я. Смолин)以及维·彼得罗夫(В.В. Петров),他们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名新生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工作能力。应该指出的是,冈察洛夫很走运,不仅有好的老师,他的同学们也不错,他所在班级的发展潜力非常大。即便这些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当中很多人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冈察洛夫仍然以某种特殊的天赋和罕见的顽强执着显得与众不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1977年冈察洛夫以优异的成绩从东方系毕业,在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开始了全日制博士阶段的学习。中途他由于紧急应征入伍进入苏联军队服役而中断了学业,但他在1980年复员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82年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出色地完成了题为《中华帝国的外交:1127-1142年间金国与宋朝的关系》(Гончаров, 1986)的历史学副博士论文答辩,后来他的论文以专著形式出版。

似乎冈察洛夫的余生注定与学术相伴。他开始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市)工作,经历了从初级实验员到苏中关系研究和预测科科长(他从1985年至1992年担任该职位)的道路。1984年至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当时中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积极前进。来华这一年他第一次亲

眼目睹了他一生致力研究的国家,并将自己在此之前纯粹的学术知识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1992年冈察洛夫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进修,这也是促其成为一名汉学实践家的重要经历。

1992年是俄罗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对于汉学家冈察洛夫的人生也是如此。就在当年他被邀请到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担任第一亚洲局参赞。1993年冈察洛夫开始在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工作,先任参赞,后来成为高级参赞,最后是公使衔参赞(2001-2006年)。他在这些岗位上创造性地把他的学术研究、汉语知识还有对中国的了解结合了起来,在中俄协作的重要阶段,他对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冈察洛夫在外交部工作期间直接参与了与中方的各项谈判,涉及军事技术、核能、航天(包括载人航天)和能源合作领域的重大项目实施问题,以及环保、卫生、教育、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出口控制、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用航空、农业领域的合作问题。

冈察洛夫曾领导俄专家组参加与中方的谈判,协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文件内容——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他为条约的制定做出了贡献,因此于2004年被授予友谊勋章。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一员,冈察洛夫参加了北京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前三轮谈判,以及促成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初期会谈,还直接参与了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工作。

2006-2012年冈察洛夫在北京担任俄罗斯石油公司驻亚太地区的代表处主任,积极巩固中俄经济关系。2012年他再次短暂地重返学术活动和教学,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和该校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还是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的客座教授。自2015年12月起,他担任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驻华代表处主任。

外交部对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学院毕业生的水平和能力评价很高,因此我校的许多其他毕业生也有机会在外交部里工作。继冈察洛夫后,斯别什涅夫的学生陶米恒(Е.Ю. Томихин)也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1989年陶米恒毕业于东方系汉语教研室。他进入俄外交部工作时,部里非常需要中国方面的优秀专家,因此他担任了各种职位,其中包括外交部第一亚洲局副局长。后来他到驻华大使馆工作,曾任公使衔参赞(至2016年)。目前陶米恒是无任所大使。

最后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圣彼得堡大学在建校后培养了极好的高水平中国问题专家,不论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还是苏联时期,或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的今天,他们在俄罗斯对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人才。重要的是延续这个重要的教学方向,并不断加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 [1] БРЕЖНЕВ А.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 [2] ГОНЧАРОВ С.Н. Китайская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империями Цзинь и Сун, 1127-1142[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 [3] ГРИГОРЬЕВ В.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течение первых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 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Совет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В. Безобразова и Комп, 1870.
- [4] КОТВИЧ В.Л. Памяти Д.Д. Покотилова [N].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зета. 1908. № 48.
- [5]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Факульте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Т.1. 1851-1864 гг.[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 1905.

- [6] ПАК Б.Б.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К. И. Вебер и Корея[М].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2013.
- [7] ПЕТРОВ А.А. Ван Би: 226–249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М].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36.
- [8] ПОКОТИЛОВ Д.Д. Некролог//Нива. 1908(11): 216.
- [9] СПЕШНЕВ Н.А. Пекин – страна моего детства. Китайская рапсодия. Записки синхро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Бельведер, 2004.
- [10]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 (30–90-е годы)[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11]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Я провожал на поезд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до самой границы [J]. РУССКИЙМИР.RU. 2009(10): 14–17.
- [12] ФЕДОТОВ В.П. Полвека вместе с Китае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запис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 [13] ХОХЛОВ А.Н. 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окотиллов [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11(5): 36–54.

Russian Diplomatic Talents Training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ino–Russia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N. A. SAMOILOV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role of graduates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USSR) and China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Graduates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primarily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have held various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of Russia in China, working there as ambassadors, advisers, consuls, and translators, and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They were always characterized by professionalism, competence, good knowledge of China and fluenc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led to the impeccable performance of their diplomatic duties. Many of the graduates and teachers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even if they were not professional diplomats, had worked in positions related to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contributing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hina; Russia; Sino–Russian relations; diplomacy

作者简介: 尼·安·萨莫依洛夫 (Н.А. Самойлов),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 教授。
译者简介: 熊乐平,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蔡晖)